

政治强迫其接受无法解释的思想，要他们轻率地走上人前说一些与自己一向主张的逻辑体系不同的事情，那么，不会再有比这更令人压抑和痛苦的事情了。要求冯友兰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要求拥有“自己固有的想法和体系”的人进行无止境的反省，并压迫他们立刻做出改变，他们的心情应该正如巴金所说的“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的那样。尽管如此，冯友兰不愧为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大学者，对自己在文革时期的违心之言进了深刻反省，于是有了“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这样一番话。

如上所述，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间，两国作家和两国文学虽然在表面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走过了一段相似的道路。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存在着政治和文学相互交织又相互对立而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政治和非政治的文学。我认为，将晚于中国20多年后在韩国短暂兴盛过的劳动文学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文学相比，就可以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据我所知，描写工人群众参与工业发展的冷战时期的中国小说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艾芜的《百炼成钢》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艾芜的小说以实现九号平炉快速炼钢过程为背景，讲述了小说主人公克服生产矛盾、错误思想矛盾、爱情矛盾等各种矛盾，经历了一番锻炼之后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故事。杜鹏程的小说描写了铁路工程队的生活，讲述了战争结束后“和平建设时期”所必须面临的内部矛盾问题。通过脱下军装恢复成为劳动人民的人们之间发生的尖锐矛盾和对立，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物形象。在韩国，这类劳动文学的创作在80年代以后开始活跃，90

年代初达到顶峰，进入2000年代几乎不见了踪影。在国内，工人运动丧失阶级斗争的性质而转到工资斗争的层面；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曾被理想化、神秘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因此韩国的劳动文学经历了失去读者、杂志停刊的一段过程。

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劳动文学在中国受到国家的积极指导和强烈支持而繁荣，而在韩国却是在严密监视与镇压下兴起的。然而，随着国家干涉的消失，自由创作环境得以实现，两国的劳动文学却都走上了衰退的道路。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文学的潮流不会按照国家要求的方向发展。文学不是国家指导和管理的领域，而是作家自主描绘的领域。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中韩两国文学虽然在遭遇权力的方式上互不相同，但从中吸取的教训是相同的。

3.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中韩两国迅速解决了冷战体制的遗留问题，发展成尤为重要的邻里关系。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是最有力的说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额，稳居第一位。这种关系从经济层面开始突破，紧接着在政治、军事、文化层面上也开始以密切的关系得以发展。但是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并不认为彼此比西方国家更重要。都认为彼此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地方，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和西方各国。从这一点来看，在文化层面上，西化还处于进行时，对东亚文化的自豪感还未能找到重建的机会。

前几年，我曾读过楼宇烈教授的《中国的品格》，书中谈到了有几处值得学习的在韩国遗留下来的儒教文化美德，其中一个